

丘镇英教授

文集

◆ 丘成桐 编著

余固守己志，不屈不挠，不轻易随人之上下，故师友辈中有鸡群矫鹤之誉。
好读书可以忘餐，好抱不平，有侠客气，有忠于一而不移之清名，不苟同习俗之劲节。

丘镇英先生自传



◆ 丘成桐 编著

丘镇英教授 文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镇英教授文集 / 丘成桐编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8-08185-6

I. ①丘… II. ①丘… III. ①丘镇英(1911~1963)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1325 号

丘镇英教授文集

丘成桐 编著

责任编辑 冯社宁

封面设计 张作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700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185-6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前言 丘成桐	1
蕉岭丘先生之碑 钟应梅	5
何炳棣 序	6
饶宗颐 序	9
丘镇英先生自传	10
丘镇英先生生平大事简表	16
母亲——丘成桐	18

甲 史学论著之部

一 中国上古史纲目	25
二 清代中枢政制探讨	46
三 中国“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及其田制发展	80
四 中国近代史讲稿	84
五 经济史讲义	114

乙 文学论著之部

一 海山楼诗钞	177
二 关于《岭云海日楼诗钞》	244
三 介绍一位不大知名的“落叶诗人”——黄钊	254
四 幻想与单恋	257
五 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261

丙 哲学论著之部

一 中国哲学史讲稿	271
二 儒家哲学之研究(提纲)	293
三 儒家的教育哲学	294
四 儒家的经济哲学	297

五	禅宗与宋明道学之研究(提纲)	304
六	子学研究讲稿	306
七	西洋哲学史	320
	附:王韶生——《西洋哲学史》评介	465
八	哲学概论	467
九	哲学概论笔记	487
十	新哲学大纲批判(提纲)	500
十一	理则学讲稿	501
十二	人类爱的三种形式及其价值	523
编先父遗书后序		526

前 言

丘成桐

父亲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这些年来，为了学业、为了家庭，忙这忙那，总想不起父亲遗作需要整理，以后大哥和母亲相继病故，心中再增伤亡之痛，才省起这些年来的不孝，幸好几年前父亲生前好友曾璧中伯父和我联络，又得到当时哈佛大学陈熙远和周勤两位的鼎力协助，终能将父亲的遗作初稿整理出来。在联络出版过程中，交通大学林松山教授出力最夥，前后参与帮忙校稿的学生与助理，包括中研院史语所的简志仲、江玮平、贺香绫、阎秀慧、李文佩与张志惠，以及交通大学的林吟衡、张慧珊与李佩玲等人，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父亲的生平和父亲的看法一直指导着我的成长和我做学问的态度，父亲遗留下来的片断文章往往使我回想当年在家中的谈话，也惊觉这四十多年来我的想法受到他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希望父亲遗集的出版能够表达我对父亲感激和怀念的一点心意。

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四岁，那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迅即变为哀伤，一方面要面对生活的挑战，一方面要望向遥远的前程，假如不是父亲的教诲，我们这家人可能已经潦倒了。当年雄心勃勃的少年，如今也年近半百，前尘往事，使人叹息。前年重游故居，风景虽殊，所幸赤心犹在。当年父亲论学的热诚还在激励着我！三十多年来的经过，历历在目，然而这许多微小的往事，堆积起来，却影响了我半生的事业。

我丘家世居广东蕉岭县，务农为业，祖父通晓中医，父亲以儒者自许。虽在香港，大年初一必须祭祖，如有不敬，必遭责骂。祖母去世二十年后，父亲谈及祖母弥留时由他抱着的光景，真情流露，使孩子们感动不已。父亲在农村长大，保存了很多农村的习惯，农村里敦厚淳朴的处世态度也就是我们的家教。

父亲年少时聪慧，祖父期以大成，不幸祖父早逝，又值日军入侵，全国沸腾，蕉岭中学毕业后即入中央军校，然因体弱不禁，转厦门大学，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念经济治世之学。返国后奔走抗日，战后在汕头参预救济总署，廉洁自律，政府授予奖金，可见父亲节操一斑。

一九四九年父亲携家人七口，及外婆一家五口到香港，经营农场以维持生计。失败后随凌道扬博士办崇基学院，又随陈树渠先生创办香江学院。当时家住元朗，到学校约需两小时，终日奔波，只有在深夜或假日才能与家人相聚，所得薪金不够家用，母亲和姊妹们做手工副业帮补家用，往往借贷维持，早上不知道晚餐是吃面、

吃饭、还是饿肚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上学校的路上遇到外婆，她很兴奋地要我中午到她家，说是有好东西吃，原来是她新买了酱油，既有饭又有酱油，在那时来说还是不错的了。

穷苦的农村生活却有它自然的情趣，稻田里的青蛙，池塘里的鱼，秋天收获后的农地，都是一家人的消闲场所，而父亲也常对景吟诗。

由于交通不方便，一九五四年夏，父亲终于决定迁居沙田，租住紫霞苑。该处林木茂盛，但不及一年，家人大都生病。从前我在元朗上学时受惊，辍学卧病，于此复发，大哥也染上无名之疾（以后方知是脑瘤）。父亲处方开药，焦急万分。病稍好后，决定迁居龙凤台，靠山面水，风景如画，一家人都很愉快。父亲将外祖父赠送他订婚时的诗和画挂在客厅中，“能使欧公让出头，眉山原不等庸流。……少壮情怀多任侠，文章渊雅得风骚……”父亲亦以此自许。

我十岁时，父亲要大哥和我练柳公权的字，念唐诗、宋词，跟着又背诵古文，第一篇读《礼记》“嗟来之食”，然后念“百里奚，五羊皮”、《五柳先生传》、《孔子世家》等短文。有一次父亲带我们一家坐公共汽车到元朗拜年，路上经过大雾山，随口说“云遮大雾山”叫我们对下联，我碰运气说“雨洒浅水湾”，父亲很欣赏，以为孺子可教，结果就开始背诵长篇古文，如《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等。当时年幼，随背诵外，不解其意，及后年长，却得益不少。《孔子世家》：“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至今还是我做学问的座右铭。

小时候，我们喜欢看武侠小说，父亲以为这些小说素质不高，不想我们看，结果买了很多古典的章回小说，并要求我背诵小说里的诗词，我确也背熟了一些，到现在也还记得。《红楼梦》里面的人和事都和诗词有关，我看了很多遍。在父亲去世时，感触特别深刻。在中学一年级时，父亲叫我看鲁迅、王国维等先生著作，还有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新原人》等哲学书，那是更困难了。西方的书也叫我们看，如歌德的《浮士德》等，虽然不容易，偶尔翻翻，竟然有些好处。这种种家庭教育，终于养成大哥和我喜欢阅读课外书的习惯，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维。

我在沙田小学读书，成绩不算好，父亲很关心我的前途，尤其是中学教育，托了他的朋友林汇丰先生介绍进入培正中学，这可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优越的校风、卓越的教师，无论在数学和中文方面的教育都影响了我一辈子。

沙田的风景优美，父亲又好热闹，家中虽穷，却多宴客，学生往往聚集在小客厅中讨论学问。时而禅宗、时而孔孟、时而程朱、时而阳明、时而西洋哲学，不一而足。父亲喜欢自由的学术气氛，虽然台湾的严家淦、钟皎光和梁寒操等先生位居显要，与父亲交往，父亲也不愿迁台。当时在香港学术界潜伏特务，父亲对此极为不满。父亲曾考虑过办出版社和中小学，可是没有经济的背景，结果都是空谈。然而培养年青学者成材，却是父亲的毕生志愿。

父亲治学极为细心，五十年代以后，主要是儒家哲学，尤其是王阳明的学说。他以为治国学必先追究整个中国哲学的源流，所以除孔孟及春秋诸子外，花了不少时间在禅宗和佛学的研究上，家中也藏了不少佛经，他也到佛寺跟和尚交谈。当时

香港缺乏图书,父亲的外文根基又不够,关于西洋哲学的资料都是从日本方面翻译得来的。当时钱穆先生住沙田,父亲曾多次拜候钱先生讨论学问。父亲过世后,钱先生和钱夫人对我们多有所照顾,一九八五年我到台湾时专程拜访,钱先生还谈起当时的交往。父亲热爱儒家中庸之道,往往说“要打倒孔家店,要先晓得孔家店贩卖些什么货色。”我的中学老师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指出我老师看法的错误,当时年少,略有所知,现在则模糊不清了。

最近整理父亲遗物时,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他一年的薪俸才两千元港币,房子月租一百元,缴交学费和膳费后,所剩无几了。在香港找事情须讲关系,所以父亲没有得到好位置,只得又兼联合书院的钟点教员,奔走于香港、九龙和沙田三地之间,往往带药上课,而后帮助凌道扬博士到南洋筹钱办银行又失败。家中十口,儿女年龄渐大,二房一厅已不足需要,记得父亲念黄仲则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也可以想象贫穷的悲哀了。

父亲的学生有不少热心仗义的,有一位愿意借钱让父亲去租官地盖房子,结果投标失败,原因在于父亲不懂得如何送政府官员和土豪红包。家里住房日渐局促,大姊自愿到英国读护士,二姊则到澳门中学住宿,该校校长在国内时欠父亲一笔债(此人在国内贪污坐牢,父亲花了不少钱替他担保),二姊得以免费住宿,但竟因此染病,拖延了三年,父母尽力奔走,终于沉痾不起。二姊死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了,我也第一次尝到生离死别的滋味。

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减少父亲对年轻人的热情,邻居少年愿意上进,父亲必定帮忙,常指导他们练习毛笔字。当时香江学院有一个学生家贫辍学,工作不堪,父亲瞒着母亲支持她。父亲过世后,她和她的丈夫常来探望我们。

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饥荒,大量饥民涌向香港,广州有一位堂哥此时来港,在我家长住,家中姊妹众多,更形困难。为了照顾伯父的后裔,父亲决定替堂哥缴学费上学院念书,当时我们的家境连儿女上学都有问题,在一般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到了一九六二年,父亲已在香江学院做文史学系系主任十一年,教授和学生的素质已臻一流,父亲也引以为傲。不料校长陈树渠与台湾国民党勾结,在该年十月以莫须有的理由中断父亲的系主任合约,父亲愤而辞职。家中虽然辛苦,母亲还是很支持父亲的决定,义不受辱。

父亲事业既受挫,二姊又刚去世,心中极度忧郁,在一九六三年过农历年时误吃醉蟹,卧病在床,往往夜不能寐,犹苦苦思考宋明理学的渊源,家中局促、孩子争吵影响了父亲的健康。经济既大不景气,母亲到处借贷,连亲手抚养成人的亲兄弟也拒绝见面。生存的权利和个人的尊严,竟然让一个学者必须有所选择!但父亲始终维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他以业余的中医常识医治自己,最后由学生帮忙送进养和医院,为庸医所误,尿毒入脑,口不能言,死时连遗言都没有。

一九六三年,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一年,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冲击太大了,一个正在享受天伦之乐、正在受到保护和指导的孩子,突然要面对彷徨的前途。

亲戚、师长和同学都在观望着，究竟这一家人会怎样下去呢？有人希望我们会消沉、有人叹息、有人伸出同情的手。然而，母亲坚强的意志，却使我们做儿女的毫无畏惧的站立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实就是因为母亲和儿女们看到父亲的仁心壮志，看到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才经得起这艰苦的磨炼。

在父亲去世那几天，一切都很麻木，在灵堂里、在坟地上，我跟着母亲和亲友们，也说不上十分的哀痛，却是难以相信父亲已经去世。接着那半年，我天天背诵父亲从前教过的诗词和古文，这些著作突然都变得很有意思了。得到前人的教诲，一个天真的小孩终于成熟了。

在父亲去世的那几年，除了母亲和三姊外，他的朋友和学生无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我们家极大的支持，如王同荣、陈鉴、丘恩处、李锦镛、陈杰三、何朋、王友浩等人就常远途跋涉，看望我们孤儿寡妇。去年还见到听过父亲课的崇基学生陈耀南教授，他也还记得外祖父送给父亲的对联。到如今，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多半都已过去，昔日家门前的沧海已变为跑马场，再无当日赏月寻幽的情趣。当年热诚求学的青年，大部分未能展露才华，有些竟以写马经维生，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有风骨有才华的实在不少，为什么他们大部分都受生活煎熬之苦呢？

七年前，由于雨水的缘故，我和弟弟重修父亲的坟，但见一堆枯骨，“哲人其萎”使我悲伤。如我生不逢时，即有大智慧，这篇文章恐怕亦不敢献于先父了。

在父亲的丧礼中，有一副由他的学生陈郁彬写的挽联，可以代表我们后人对父亲的想法：

明心见心即心，心学成一统，
同天事天乐天，天地失完人。

蕉岭丘先生之碑

钟应梅(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先生讳镇英，字百刚，粤东蕉岭县人。丘于县为望族，其子弟浮海货殖，因而著籍台湾者尤众。甲午战后，清廷割台湾与日本，其时集志士、拒割地，世所称义师大将军丘逢甲者，先生之再从父也。先生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政经系。抗日军兴，任福建省政府设计委员，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于安定民生，备储糗以利戎机，献替殊多。性狷介，仕不适志而慷慨能诗，论者许为岭云海日楼之嗣音焉。

岁己丑(一九四九)，余移家海隅，始识先生，屡过其家，夫人治饌，诸子成煜成桐成栋序列下座，肃然听余与先生议论，而色然时若有所惊喜者，余固心异之矣。其后成桐成栋相继以上绩毕业于香港崇基学院数学系。成桐三年而毕四年课程，遂得奖学金赴美国柏克莱大学研究，先后受硕士博士学位。任职洛杉矶史丹福等大学教授，通宇宙之变，成一家之言。成栋亦以数学博士教授美国各大学。兄弟两人，所受世界各国之科学荣誉，不可一一数。一九八二年，成桐复受世界最高荣誉之费尔兹数学奖。岂独一门之盛，亦国人之荣也。

成桐成栋俱好文学。尝谓由诗文之静妙，可通数学之邃密。《庄子》曰：“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因思昔年动色座隅之稚子，今为智恬相养之哲士，虽由秉赋，岂得谓非家学之熏染乎？迩年，成桐成栋先后以参与数学会议道出香港，既过余谈诗，复申母梁夫人之命：嘱余为表墓之文，盖距先生谢世之岁已二十年矣。夫人与余同州里，诗礼之门，久著懿德。余已重其请，又喜二子能以学术显其亲，因奋笔为之辞曰：

碑之为体，文质相资。贤父令子，今世之奇。父积学而不克施于当世，乃教子延其光于来兹。“死而不亡者寿”，老氏之言不吾欺。幽宫吉宅，乃在荃湾之海湄。乘回风兮载云旗，神灵昭兮视此辞。

一九八二年壬戌又四月撰

何炳棣 序

一九九二年七月初，“中央研究院”第十九届院士会议开幕那天下午，公开学术演讲轮到人文组，半年多前院长吴大猷先生指定我为这次的演讲人。我讲了大约九十分钟，讲题是“孔子有教无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当日傍晚院方备有几部两层高的大型游览车，专送全体与会院士及夫人赴圆山饭店的晚宴。我和太太刚刚坐下，就有一位戴眼镜、身材魁梧、方面广颐的少壮院士自楼梯上来，声音洪亮地向我做自我介绍：“何教授，很欣赏你的演讲，我是丘成桐。”我马上站起来和他握手，并向附近相熟的院士和夫人们说：“这位连获世界最高荣誉的少壮数学家，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我这即刻的回应，几乎是不待思索、自然脱口而出的，因为我一向最注意海内外华人在世界学术和科技方面顶峰的成就，丘成桐这响亮的名字是早已熟悉的。

丘成桐坐下之后，马上就提到院士会议中经济学家顾应昌（其伯父是老辈卓越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的提案——“中研院”是否应该筹出十万美金买下苏联有关中国外交档案全部的胶片。丘成桐说这类事用不着在院士会议里讨论，其实他和以前香港中学同学中之发迹者私下就可以把这类事承担下来。这件事当时没谈下去。他立即另问我能否推荐一位真懂西藏的人，他愿自掏腰包每月支付这位专家，以为替他解答一系列有关西藏文史、宗教、政治、制度等问题之用。我立即推荐三十年代清华老同屋、古藏文一流专家、五十年代曾参加整理《五体清文鉴》藏文部分的黄明信先生。（这件事居然进行了一年多，可惜后来因黄的健康问题不得不中辍。）

回想初次见面时丘成桐那种超常爽朗、海阔天空、清澈见底、犹若赤子的性行，已经播下了他和我之间行忘年交的种子。

今夏成桐来信，问我是否愿为其先尊镇英（字百刚，1912—1963）先生遗著撰一序文，以备正式出版之用。镇英先生遗著十余种及诗稿杂文近旬始陆续收齐，当即翻读一通，惊佩之余，谨抒个人感想以备读者参考。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镇英先生知识面之异常宽广。先生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连获奖学金并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而在校期间主要自修的兴趣却在文史和哲学。七七事变前一年有半，先生勉强凑出部分费用，毅然赴日以工济读，考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修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史，颇得名教授高桥清吾的称许。此期间先生对日、英、德文（大概多半先读日译本）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名著，进行博览反思的工作，不知不觉之中已为他此后中西哲学史的讲授及研撰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一九四九年先生举家迁香港,先生除任香江学院中国文史学系主任之外,还需要在崇基和联合书院兼课才能糊口。半由个人旨趣、半由教学需要,先生于三十及五十年代一贯广事涉猎,每项科目大都依靠自修,几乎都是无师自通的。先生治学最大特色在先向西方求得最低必要的基本知识,然后在中国方面的讲授研撰,再力求沟通传统人文及较新社会科学之不同领域。在五十年代的香港,这种治学方针政策是极难能可贵的。先生一生讲授研撰重心则在哲学。自西方之哲学概论、哲学通史、理则学(逻辑)、中国先秦、宋明之儒学、禅宗、道学,以至综摄比较中西之抽象理论,如人类爱的类型、人类思维认识过程等课题,无不管窥析分,取精撷华,先以纲要形式试之于讲堂,再逐步一一撰成专书。虽先生英年病逝、壮志未酬,然其治学范畴之广、视野之阔,远非同辈一般学人所可望其项背。是以先生遗著,无论是初步规划尚欠完整的讲义,或是体系已备颇具水平的教科书,对于相信通才教育优点的青年学人与教育专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镇英先生遗著中应该特别推荐的是《西洋哲学史》。这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以简要流畅的文字,解述西方自希腊起两千五、六百年来各种哲学流派的旨要和同异,并扼要地说明上古、中世、近代三大时期哲学内涵、重点、方法、精神的演变。在导言和结论里,著者有勇气用大写意的手法,指出中西哲学基本特征之不同。著者特别注重古代希腊和十八世纪的康德,对中古欧洲的主要神学家亦不忽略,独对马、恩学说仅仅作了六页的认真评介。但此书初看似乎不免比例失调之处,正足以弥补坊间同类中文书籍之不足。尽管书中少数见解和个别论述尚可商榷,就全书言,取材丰富、引证确凿,所见者大,综合力强。此书虽于一九六一年初在香港问世,一九八五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它至今仍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教科书。

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丘氏自宋亡即自中原迁至今广东东北极隅的蕉岭。镇英先生青少年时代家道中落,但他承继了客家勤笃奋发、砥砺名节的优良传统。他在四十年代两度参加闽粤地方行政。抗战后期,日寇拟自赣州进攻闽西,先生以候选县长身份肩负赣南闽西军需民粮运输重责两年之久,完成艰巨任务,任职期间除正薪外分文不取。事后福建省政府明令褒扬并颁奖大洋五千元。日本投降后,先生曾任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专员,负责粤东潮汕各县救济事宜。这个职位是当时人所共知的肥缺,而先生两袖清风一如往昔,以致一九四九年全家迁港之后生计维艰。先生在香江学院主讲哲学、历史、经济等课十余年,声誉日隆,但一九六二年冬出于义愤,毅然辞掉中国文史学系主任的职位,全家十口因此陷入窘困状态。先生昼夜以译撰卖稿为生,以致劳瘁成疾,次夏六月溘然与世长辞。先生三十九岁时曾作《自我检讨》:“吾固守己志,不屈不挠;……好抱不平,有侠客气,有忠于一而不移之清〔名〕,有不苟同习俗之劲节。”对子女及生前相知弟子而言,先生这种浩然之气是影响深远的。

最近成桐在电话中向我提及,镇英先生在生命最后一两年里,往往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成桐那时才十二三岁,经常旁听。先生除了不时涉及宇宙、人生、认识等方

面一些终极性问题之外,对恩格斯晚年未竟之作《自然辩证法》备加赞扬,尤其注重其中所论的三个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类性质的“家庭副课”对少年成桐思维启沃之功和科哲视野之扩展是不言而喻的。

人生只有传记式的不朽。早在孔子出世的次年(纪元前五五〇年),鲁大夫叔孙豹综合前人意见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论。这种完全脱离宗教,全凭理性,全以对人类贡献为衡量标准的不朽论,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足以代表人类最高的智慧。一九八二年成桐荣获四年一度专为四十岁以下数学家所设立的费尔兹奖。次年颁奖会对成桐的贡献,作了以下的评价:

“丘的工作涵盖了整个微分几何的全部,展现了强而有力的技巧、深度与广度;也展现了丘的勇气与视野。……今天大家公认丘成桐是五十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数学家。”

成桐至今仍发奋不断攻坚,念念不忘半生事业的成功是与童少年时代所受极富启发性的父教分不开的。《礼记·祭义》:“大孝尊亲。”刊印镇英先生文集,最能使世人明了这位志行坚贞的学人,同时又是一位极不寻常的父亲。这才是当代已臻不朽的数学家表达孝思最纯真的方式。

表扬这种纯真的孝是我的义务,更是我的快慰。

丙子中秋后一日(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

饶宗颐 序

蕉岭丘氏，以诗世其家。自清季沧海先生以革命事业，著闻中外。其《岭云海日楼诗》，雄奇伟丽，噌吰铿锵之音，与《人境庐》并峙，为岭东诗坛盟主。先君撰《感旧诗存序》，流连慨叹。称美者至再。余自髫龄，讽诵暗记，佩仰之久矣。及余执教香海，识沧海后人镇英教授，以诗论交，既欣德之有邻，又喜其能嗣家声，为斯文彪蔚。梅州多雅士，竞以诗鸣，君尤轶群颖出。值抗战军兴，君尽瘁国事，橐笔戎行，蹉跎岁月，崎岖军旅之间，未能一展所怀。晚年振德香江学院，造就英才之暇，沽酒谈经，傲睨时流。其句云：“翠鸟相因依，缀以净明月。”“屋外海涛惊上下，眼前花草失高低”，堪入唐人三昧，何止方驾独漉。乃以积劳忧生，溘然下世，人共惜之。

均嗣子成桐教授，奋志力学，策高足于千里，终以畴人之伟业，蜚声寰宇。屡获国际巨奖，为世纪以来整理微分几何学与方程学诸猜想，取得证明，于拓扑学表示理论，亦多所建树。自幼失怙，深赖母教煦育，外祖梁伯聪殚心国学，得其陶冶，故复浸淫诗雅，尤好太史公书。于君虽亲炙日浅，而于君之余绪，沾恋于心，吟诵不绝于口，可谓龙骧腾骧于云路，我于成桐见之矣。君遗作无多，成桐勤加掇拾，裒成一帙，而挽余为序。余既佩成桐之成就，复感其孝思之笃，嘉成桐之能继志述事，他日文事大成，与数学交辉，天人之业，相得益彰，当以洛下閎、张平子期之。人能弘道，余又乌能测其所至哉。

壬午中秋潮州饶宗颐谨序

丘镇英先生自传^①

一、世系略述

太公望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氏，即今之丘姓也。丘氏系出中州，溯源渭北，故与中原民族胼手胝足以开疆拓土，继继绝绝，枝繁蔓衍。迨唐黄巢五代以后，播迁江淮，至宋室南渡，孤臣孽子次第越江淮而南，散居闽西、赣南、粤东、粤北，及其他各地。（见广州中山大学罗香林著《客家研究道论》及古直著《客人对》诸书）。^②

先祖若宗分支闽、赣，（见《丘氏族谱》，邹鲁著《汉族客福史》，以及友人曾璧中所作《闽民族考》，见燕京大学《禹贡》。）至季宋文信国公应诏勤王^③，蕉岭丘氏始祖创兆公，有感家国之责，入幕参军，文公督赣师败，进屯潮阳。创兆公奉养父母于蕉岭之员山，遂为今日蕉岭丘氏之开基祖，后以变乱仍陆续转徙。

丘氏为蕉岭望族，由创兆公五传而茂分东西南北四大房，北房袭居员山，钟鸣鼎食，扑地闾阎，殆占文福乡之半。洪〔秀全〕杨〔秀清〕举义，六支世孙相率渡台避难。台湾民主国副总统兼义军大元帅，堂伯逢甲（号仙根，一字仓海）其出于八世祖柯林公。^④

吾家籍居员山之扬官，高曾祖均一传，门楣衰薄，孑影茕茕，高祖父，邑庠生，有义名，曾祖父亦入邑庠序，讲教于台湾三十年，未一回而歿。祖父福寿公聪敏慈慧，以艰难起家，承高曾祖父之儒业，掌县衙卷册，分家于县城，福寿公凡二娶，初姓古，

① 编按：此文作于一九三九年，乃先生参加广东省县政人员训练所县政研究班时所拟之文。原稿涂抹增删颇多，辨识不易。又先生笔误处，谨以〔 〕订补。

② 罗香林（一九〇五——一九七八），《客家研究导论》（一九三三）。

③ 编按：文信国公，即文天祥。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宋吉水人。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理宗时举进士、知赣州。德佑初、元兵入侵，天祥发郡中豪杰及溪峒山蛮，应诏勤王。益王立，召至福州、晋左丞相、都督江西，为元兵所败、走循州。卫王立、封信国公。进屯潮阳。又为元将张弘范所败，被执拘燕三年，终不屈，遂被杀。临刑作《正气歌》以明志。著有《文山集》、《文山诗集》。事见《宋史》卷四百十八、《宋元学案》卷八十八。

④ 编按：先生此处略有误记。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台湾彰化（今苗栗）人，先世由闽之上杭，迁广东镇平，即今蕉岭，故亦署作蕉岭人。谱名秉渊，字仙根，一字仲闳，又字吉甫，号蛰仙、蛰庵、沧海，别署仓海君。辛亥革命后改名仓海，学者称仓海先生。甲午战后，倡建台湾民主国，编练义勇抵抗日军。兵败后由闽返粤，历任韩山书院山长，同文学堂总理，广东咨议局副议长，两广教育司长，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员等职。

继则姓汤,余父出于祖母汤氏,伯叔凡八人,先后殁落。今犹岿然健在者,只余冠儒伯父一人,追记上德,颇觉怆怀。

二、家庭环境

曾祖父歿后,祖父福寿公独肩祀养之责,家仅担石^①,县衙薄俸之外,靠抄写及行医所得积沙成塔,始略置田园。据祖母汤氏云,祖父秉赋聪敏,心至慈厚,日可书蝇头小楷万余字,如风驰电掣,目不旁视,为文俊逸,动辄千言,侪辈靡不叹服。无士大夫阶级气,喜与农夫野老游,犹具怜贫恤苦,并博施襟怀,歿时年五十,上至士大夫,下至轿夫、理发匠,均凭棺陨涕。祖父歿后,余业以在员山之扬官为祖母古氏所出之长二伯父独占,不分滴沥,祖母汤氏及遗孤五子,最长年十龄,即犹健在之冠儒伯父,五叔父时仅出世七月,尚在襁褓之中,余父行四,亦只四龄。祖父在县城遗产,除得县衙之小屋数椽外,每月尚可得之卷房费亦不过数百钱,祖母以巾幗之才,含辛茹苦,抚育诸孤。余七、八龄时,祖母常抱余于膝上,往复述其当年为况,历历犹在目前。伯父与二、三两伯父少小赴南洋经商,二、三两伯父均早逝。伯父好吟讽且久离乡井,不与家事。余父集熙(字逢光,别号愚英)与五叔父集唐(字逢辰)生而岐嶷^②,处身艰困,祖父莫逆交邑宿儒徐习儒先生,免束脩教之读,弱冠之年,即可卓然自立。据余父对余言,当年伊与五叔半工读时,无馀钱购纸,每日将集城隍庙之香袋纸为习字材料,隔三日始见饭一餐。嗟乎!“困而后学”,其此之谓乎?

迨家堂伯逢甲由台岛归,余父入其幕,以不满清颀预,遂奋志入广东省立统计学校,毕业后助家堂伯从事于教育救国,与丘君毅等创办城区公学,及后兴创兆学校。曾历充蕉平税务局长、羊子殿矿务局局长,及蕉岭、大埔、兴宁、龙川等县秘书、总务科长等职,均著政声。以生齿日繁,所入仅敷家费,余父性慈厚谨严,酷似祖父,待人忠恕尤超先德,在邑中事无大小悉听调处,知命之年,国府选为举士,秉赋绝伦,为文简练可读,得力左史。知实业为建国之本,已开矿产,复提倡纺织业,兼习医学,人多知其技明,政馀有请必应,但不收分文。有贫者且施予药资,邑内编氓至今犹广颂其德。侍母至孝,定省晨昏,靡不躬亲,祖母稍不悦,即设法以释之,至怡然始去,待兄弟之友爱尤足风世。壮年以后,以一身负全家五十余口之生活教育费,终其生无闲言。母陈氏,为外祖父增喜公之长女,大家闺秀,处家温婉,助余父披荆斩棘撑持家务,凡八出:六子二女;长女早逝,次女美英已适人,余行第五,至前月始与世交梅(县)宿儒梁伯聪先生之次女梁若琳女士订婚,借了未了之缘。长兄宗英电政专门学校毕业,曾充军旅参谋及平远电报局长,民十四年改任蕉岭电局

^① 编注:担石,喻储量之少。《后汉书·明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

^② 编注:岐嶷,称人聪明有识。《诗·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诗传》:“岐,知意也;嶷,识也。”

长,尽忠职守以至于今。二兄和英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辞赋文章早著于乡里,壮岁从事于国民革命,曾历充营团党代表、八路总政治部编纂科长、东征之役(即广州事变前)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淮盐务视察员、皖南盐务视察员、及两广盐务视察员等职,积劳成疾,以华富之年未娶而卒。三兄幹伟中学校毕业后改业商,现任职邑蕉武路总站站长。四兄儒英肄业上海大夏大学,曾历充蕉岭、兴宁龙川河源秘书及公安局长等职,卓著政绩,龙河民众曾赠送奖额铭鼎表扬。因体弱辞职,今仍休养在家。六弟庆元与余同渡日本,肄业东京明治大学,七七归来,曾历充蕉岭县立镇南等中学教员,本期应南宁大厦大学附中之聘,充教员兼主任室秘书,南宁陷后归抵韶州。

揆余家自祖母汤氏歿后,势迫分炊,只余父所传现亦二十余口,时家仅小康,民国廿年余父歿,二兄又于次年继逝,家道中落,余尚在弱冠之年,学无所就,全凭长四兄艰难苦撑,教之成人,始有今日,叙述家典,益奋吾志。

三、就学时代

余生辛亥当鼎革之秋,故余父名余名曰“庆定”,纪念共和已定之意。五岁启蒙,《论》、《孟》可朗朗上口,七岁随父母至大埔,改入新制小学,未半年,名列前茅。余父爱余甚,每晚温诵日课后即课以《唐诗三百首》,期年能属对作诗。曾作有“云趋分水凹,月照镇山楼”之联语,父执辈奖赞不已,目为才子。以埔邑水土不服,归原籍蕉岭,复就塾师学,每试辄冠。十一岁入县立模范国民学校,第一期卒業,县会试选考第一,转入城区高等小学校,十四岁卒業。余幼年好听祖母讲洪杨掌故及塾师讲唐宋传奇,十一岁窃读《水浒》,五日内不分宵旰读完。至城区卒業时,与四兄合购之传奇小说已盈箱累篋矣。余父以余体弱屡禁阅,均弗听。以所予零钱积为购书之用,祖母佞佛,博记经典,耄耋之年,犹能为幼孙辈复诵《金刚经》、《心经》,余尝以书比勘,一字无遗,佛家因缘之说、济世利他之怀,已深入幼小无邪之脑际,至今余对国家社会,仍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殆亦奠基于此,祖母极爱余,十二龄时即供祖母炊事,直至伊歿方辍。城区毕业后,与四兄合延前清庠生丘海筹教授经史时,已滥觞于书写才子佳人之鸳鸯蝴蝶派小说,及创作异闻,酷仿骈体、好吟风弄月。十六岁入蕉岭县立中学,同班同学百五十余人,分甲乙两班,人才济济,忠信皆是。余由入学始即得奖学金至毕业,校长东莞刘懋江先生曾赠苏批《孟子》、《左传》诸书以励余学,并时属步韵。时当五四运动后,国民革命正蓬勃焕发,记余初订阅《学生文艺丛刊》、《学生杂志》,间付稿发表于《东方创造日报》,遂转其嗜好于新小说,凡有新刊,不论译作,争先购读。邑中专售新刊之新华书局,年中购书最多者首推余与挚友丘实华云。教员中亦有借余藏书者。余心爱之《曼殊全集》即被某教员借去未还。以创作欲驱使,纠同志倡组“新文艺研究会”,并主编校刊与学生园地之《蕉中旬刊》。至于余之人生观、社会观,初期受佛、老、庄之影响极深,踏杂游侠观念,后为西洋哲学家如卢梭(J. J. Rousseau)与斯宾诺莎(Spinoza)